



W e n m i n g   d e   B o y i

# 文明的博弈

## ——16至19世纪澳门文化 长波段的历史考察

◎刘然玲 / 著

廣東省出版集團  
广东人民出版社



W e n m i n g   d e   B o y i

# 文明的博弈

—16至19世纪澳门文化  
长波段的历史考察

◎刘然玲 / 著

廣東省出版集團  
广东人民出版社  
·广州·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文明的博弈：16 至 19 世纪澳门文化长波段的历史考察 / 刘然玲著。  
— 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8.6  
(澳门丛书)  
ISBN 978 - 7 - 218 - 05844 - 3  
I. 文... II. 刘... III. 文化史—研究—澳门—16 世纪～19 世纪  
IV. K296.5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073096 号

---

责任编辑	韦 羽
封面设计	方楚涓
责任技编	黎碧霞
出版发行	广东人民出版社
印 刷	台山市人民印刷厂有限公司 (厂址: 台山市北坑工业开发区)
开 本	787 毫米×1092 毫米 1/16
印 张	25.25
插 页	2
字 数	360 千
版 次	2008 年 6 月第 1 版 2008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2,000 册
书 号	ISBN 978 - 7 - 218 - 05844 - 3
定 价	42.00 元

如果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出版社(020-83795749)联系调换。

【出版社网址:<http://www.gdpph.com> 电子邮箱:[sales@gdpph.com](mailto:sales@gdpph.com)

图书营销中心:020-37579604 37579695】

# 序　一

我的好友刘然玲博士，是何芳川教授的弟子。何芳川先生是“史学研究法”的代表人物之一，他的学术思想对我的学术研究影响很大。我与刘然玲博士的学术渊源，要追溯到 2000 年初，那时我正在撰写《中法文化交流史论》一书，刘然玲博士在读研二时，就向我提出希望我为她的硕士论文写序。刘然玲博士的论文《文明的博弈：16 至 19 世纪澳门文化长波段的历史考察》即将出版成书。她要我为这本书写一篇序，并说她知道她的导师何芳川<sup>\*</sup>教授与我在世界史、特别是文化交流史方面有相同的兴趣，而且曾有合作写书的长期计划；但如今她这位导师已不能为她作序了，觉得找我写序是恰当不过的。念及遽然辞世的好友是我与这本书之间的学术纽带，我立即同意了。我详细地阅读了这本书，觉得可以向读者们郑重推荐。

北京大学早期的知名学者姚永朴教授（我妻子的外曾祖父）著有《史学研究法》一种。我年轻时就读过这本以文言文写成的历史学的方法论，从中受到不少启发。近年来，我对法国二十世纪杰出的历史学家布罗代尔很感兴趣，也从他的书中学习到一些历史学的方法论。他们都注重史观建立的重要性，史料选取的严谨性以及史论辨析的科学性。刘然玲博士在本书中所采用的史观、史料、史论都很符合中法两位学者所揭示的历史研究的科学精神。

澳门虽是弹丸之地，但它是儒、道、佛三家兼备的中华文化与以基督教及重商主义为代表的欧西近代文明的交汇点。这个交汇点历时近五百年而至今未变。本书开宗明义就点出了澳门文化的形成在世界史中的重要地位。这个地位虽然可以与果阿、马六甲、长崎等早期葡萄牙人聚集地相比较，但又有其他

\* 何芳川（1939—2006 年），著名历史学家，历任北京大学历史系主任、北京大学副校长，中国史学会副会长、中国亚太学会副会长等。在非洲史、华侨华人史、亚太区域史等领域成就斐然。



几个地方所不可取代的重要性。这样一个宽广的视角与长时段的观察就是本书的史观。

然而，对于澳门文化的特质与形成过程，不能只以广阔视角快速扫描或以“长时段”（即布罗代尔所说的“de longue durée”）作粗略观察来断定。从葡萄牙人初抵珠江口，到葡人强占澳门，到澳门以一个“欧洲”城市的面貌出现，再到今日回归中国这近500年的时段中，充满着许许多多个人与团体的活动与经验。这些都是研究澳门历史与文化的学者所应挖掘与梳理的史料。本书作者所挑选的许多史料大都很有意义。比如说，对方济各·沙勿略的传教热诚与策略的描述，对“神父之船”的介绍与分析，对妈祖文化与商业文化的互动的阐明，对“番妇”居澳合法化的提点等等，都向读者提供了弥足珍贵的史料，也为作者提出的观点——“递进重构”模式提供了历史事实的支撑。

一个具有创新思维的学者，对自己发掘与掌握的资料必然会归纳分析，并以之为基础，寻求推进研究课题的特定方向与方法。我认为本书的史论部分相当新颖且具开拓性。

本书为澳门文化研究提出了一个新视角，既关注这些文化之间相互融合形成的关系，更注重它们之间的“差异”和在澳门历史发展过程中相互交流、包容或渗透所产生的复杂关系以及最终生成的澳门新文化形态。作者还用宏观结构和微观动力相结合的研究方法，从三个层次来展现澳门文化发展的复杂性和趋向，即从全球化的角度俯视澳门，从区域化的研究审视澳门，再从澳门本土化的发展展望世界。

我个人对多元文化社会的文化融合过程特别感兴趣。对多种异质文化相遇后的相互影响，刘然玲博士提出“物理作用”后的“混合物”与“化学作用”后的“化合物”两种情况。这两种情况应该是代表两种结果或是寻求的目标。加拿大前总理杜鲁多（P. E. Trudeau）在上世纪七十年即曾主张加拿大境内的各民族应共同组成一幅拼图（mosaic），认为美国人所自豪的熔炉（melting pot）并不可取。其实，在400多年“递进重构”的过程中，澳门文化既有拼图，又有熔炉，还包括了两者之间



的不同组合。华裔天主教徒，葡中混血信奉天主教说葡语的“土生葡人”，以及葡人与华人或马来人混血，但于 19 世纪开始转用英语的“英语葡人”这三个不同社群就是澳门人口与文化多样性的生动说明。

刘然玲博士提出的“递进重构”模式不限于澳门一地，也不仅限于果阿、帝汶等前葡萄牙殖民地。它应该可以适用于更多曾经长期有多种文化共存的地区。譬如，位于地中海中部的岛国马耳他，其面积和人口都与澳门相仿。它的正式历史由公元前 800 年腓尼基人向它殖民开始。从公元前 3 世纪起，经过罗马人，希腊人，阿拉伯人前后约 1300 年的统治之后，它于 11 世纪末被源自北欧的诺曼人占领，16 世纪又转由被奥斯曼人驱逐出地中海东部的十字军残余所统治。自 19 世纪初迄 20 世纪中叶，它是英国的殖民地，地中海区域重要的转口贸易中心。马耳他于 1964 年独立，2004 年加入欧盟。今天的马耳他是一个经过“熔炉”2800 多年长期“化学作用”的纯一“化合物”：它的公民几乎完全是看起来像南欧人与北非人融合而成的，操属于闪米语族的马耳他语（近似阿拉伯语但使用许多意大利语和英语借词，用拉丁字母拼写），信奉天主教的马耳他族。

恰似澳门自我定位为中华文化地区与拉丁文化地区的界面，马耳他基于它的地理、历史、语言、文化自我定位为欧盟与阿拉伯联盟之间的界面。有兴趣的学者大可以用刘然玲博士在本书中以澳门为案例所提供的理论性的分析框架来研究马耳他及其他地区的地区所历经的交汇与融合的过程。正当全世界许多地区都经历异质文化相互激荡和相互融合之际，这本以世界历史为着眼点，以澳门文化的发展过程为落脚点的新书确实具有特殊价值。

张信刚\*

2008 年 3 月于未名湖畔

\* 张信刚（1940—），原香港城市大学校长、荣休教授，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名誉教授，英国皇家工程学院外籍院士。



## 序二

“历史研究者，其研究对象是过去，但其研究方法却是未来。”这是中国著名学者余英时先生对历史学研究的精辟论断。余先生的这一论断，对我的研究工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我所从事的研究，虽然以澳门历史为研究对象，但其研究方法却是面向未来的。我所希望达到的目的，是通过研究过去，从而能够更好地面对未来。我所希望达到的结果，是通过研究过去，从而能够更好地面对未来。

最近 20 多年，澳门历史文化研究有了长足的进步。尤其近 10 年来，在越来越多年轻学者的积极参与和努力推动下，其纵深发展的趋势十分明显，而且取得了不少令人瞩目的成果。从早年的泛泛而论到近年的微观探索，无疑是可喜的转变，但一段时间后，我们又需要回头用宏观视野来考察。只有这样反复不断地远观近窥，才不会在深入探索的过程中迷失方向，才能在往后的深度研究中取得更大的成绩。然玲的博士论文，正是此一尝试的结果。

以长时段的全球视角来考察澳门历史，既十分重要也极其必要，因为澳门的开埠与发展就被视为早期全球化的结晶。换一句话说，如果文史学界不这么做，澳门弹丸之地的历史意义和文化价值就无从彰显。我们必须承认，西方的文艺复兴、大航海活动不仅改变了西方世界本身，也深刻影响了近代全球格局的走向，亚洲和中国政治、经济和社会因而无可避免地发生了急剧变化。作为中西方对接最早、也最久远的澳门，身临其境地目睹、感受和经历了不同文明的交流和碰撞，其历史作用和意义是不言而喻的。客观研究这一段历史，科学重构其演变过程，不仅具有重要的学术理论价值，对当今东西方文明交汇融合的实践也不无启示。

葡萄牙基于其特殊的政治社会环境和地理位置，在欧洲早期航海扩张中脱颖而出，一度引领世界早期全球化的潮流。在西方东扩的进程中，中西文明也由于新航路的开通和海洋贸易的大规模迅速发展而从自守封闭走向相遇、相识、相交和相融。



在西风压倒东风的大背景下，中国南海之滨的澳门为葡萄牙人所据居，成为中国最早对外开放的商贸港口，也成为中国最早全方位接触西方文明的城市。从这个角度看，以中华文化为主体的澳门文化的近代发展是在全球背景下展开的，而对这一历史进程的解读，也必须从东西方文明自我封闭到相互碰撞、互动重组为一个新的全球世界这样一个历史大背景中来审视，并将其视为一个动态演进的过程来剖析。

在一篇论文中全面系统分析和研究 16 至 19 世纪的澳门文化发展史，回顾与思考长达四百年的澳门文化发展脉络，其勇可敬，其志可嘉，但是否科学客观而令人信服，会否显得过于简单粗浅？这种担心不无道理。不仅读者会产生疑窦，作者在选题和写作过程中也有同样忧虑。至清期前期，中国人的观念中只有朝代、天干地支，并没有世纪的概念。而如今我们用现代人的眼光，并将其纳入世纪的范畴之下，去评价褒贬过去的事件、人物，去解构分析其纵横交错的关系，难免有牵强附会之意味。然而，诚如马克思所说，“对人类生活形式的思索，从而对这些形式的科学分析，总是采取同实际发展相反的道路。这种思索是从事后开始的，就是说，是从发展过程完成的结果开始的。”<sup>①</sup> 确实，史学思考和史学研究方法不能、也不应该受历史当事者的知识水平和文化观念所局限，用长波段、世纪更替的眼光看待历史，也逐渐为史学家认同，成为一种常用的史学研究方法。更重要的是，16 至 19 世纪的澳门，确实是一个激动人心的时代，是一段发人深省的历史。这期间的澳门无论成败喜悲，都真切而深刻地反映了并影响着中国近代史的演变，尤其是在国际关系、外交方略等领域，无不给国人提供成功者的经验和失败者的教训。从这个意义上讲，本书对这四百年的文化发展的回顾和梳理是非常必要的，也是非常重要的。

然玲以澳门作个案，把研究范围锁定在澳门错综复杂、神

<sup>①</sup> [德] 马克思：《商品和货币》，《资本论》第一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十四卷，人民出版社，2001 年版，第 93 页。



奇独特的历史背景和丰富、多元的文化环境，对这一较长历史时期澳门出现的一些重要文化现象和人文景观进行深入探讨和理论分析，不仅有利于人们去解读 16 至 19 世纪澳门文化发展以及东西方文化交往的演进过程，也为我们更好地认识东、西方文明勾画出一个有用的参照系，为今天我们与西方人的进一步交流提供了某种借鉴。正如她开宗明义地指出：该书的写作宗旨是希望“从宏观层面回顾东西方文明的特点和相互交往的历史，以澳门文化发展与文化特征的演变为主线，从大历史的角度审视夹缝中的澳门生存与发展。”

在本书中，然玲对大量文献进行了研读、比较和综论，并提出了她自己的观点。她认为，如果从文化发展的角度审视澳门，有四种文化向量深刻影响着澳门的发展轨迹：国家政治文化、地方文化、商业文化和宗教文化，而且这四种因素在各个历史发展阶段都经历了复杂的变迁，对澳门文化的影响力度也时大时小。在早期，以耶稣会为代表的“拉丁文化”的入侵给澳门独特文化的形成奠定了基础，带来了发展动力。到 17 世纪中叶，则迎来了澳门重商主义的辉煌。这一时期，作为两条全球贸易航线的中继站，澳门不仅受到西方的文化影响，更由于处于东亚、东南亚海域的朝贡贸易网上，也与周边区域的文明产生互动，在东亚、东南亚海域的贸易网上还形成了“多条文化传播带和异质文化交汇圈”。入清以后，澳门文化不仅递进发展，又加入了新的元素，在演进中更加突出了国家权力因素。澳门作为明清两朝处理对外关系体制之内的一种特殊治理模式，随着时局的变化和国势国力的兴衰，中葡在澳门的力量表现出此消彼长、时疏时紧的现象。中国政府在清前期逐步加强了国家意识形态在澳门的主导性地位，澳门在整个中国政治文明中的地位有所上升。同时，葡萄牙人从初期主要强调澳门远东基督教传播中心和贸易中转站的地位和作用，逐渐突出、强化了其远东殖民地的国家权力因素，试图在意识形态、文化导向方面使澳门走向“西化”。于是，清葡双方围绕着澳门问题出现了一系列权力角逐、较量和斗争。但是，基于中国自古以来的羁



靡、怀柔的对外宽容文化观，也由于居澳葡人对中国文化认识深度的加强及其对自身文化和行为的不断调适，葡人最终赢得了长期居澳的特殊身份与地位。从 17 世纪后半叶到 18 世纪末的百余年间，西方文化进入澳门的步伐加快，影响力度加深，澳门地方文化的特色日益成熟，多元文化模式日益清晰突出，形成了与内地文化氛围迥异、个性彰显的城市文化特色。鸦片战争以后，澳门的商业文化和宗教文化开始受到英国新兴殖民文化的深刻影响。同时，随着清朝国力的衰退，澳门无法再受到天朝的特殊庇护，殖民地与中华帝国渐行渐远。于是，中国的国家政治文化影响力度在澳门全面下降，澳门逐渐变成了一座“有着诸多历史遗产、但又停滞不前的城市”，其文化的递进重构也发展到了一个高峰而步入停滞期。

然玲通过大量的历史史料和论证，得出这样的结论——近代澳门文化应该是一种发育不健全的、甚至是“畸形”的城市文化有机体：

16 至 19 世纪澳门文化模式，既非“冲击—反应”模式，又非“传统—现代”模式，也非“帝国主义”模式，或“中国中心”模式。澳门文化所特有的这种“递进重构”发展过程，既是一个“物理反应”的过程，又是一个“化学反应”的过程，而且是多种文化不断“调适”的互动过程。其文化的组合形式既是多元文化共存的“混合物”，又是多元文化共融的“化合物”。几百年来，澳门城市对所有民族和阶层的开放性、包容性的特点一直得到延续。它集多种因素于一身，既具有殖民城市文化的一些文化特征，又带有某些资产阶级先进文化的特点，同时又带有很深的封建思想文化残余。

作为一个没有在澳门长期生活的学者，能够作出如此鞭辟透彻的分析、得出如此生动深刻的结论，足证其用心之多、用力之勤、用意之善。这一分析和结论，对我们理解当前澳门的社会文化气氛和环境、为我们探索特区发展的前路均不无助益。



澳门历史上促成多元社会和谐与共的文化元素及其互动调适机制，在全方位开放的今天受到前所未有的冲击，令社会各种深层问题和矛盾急速表面化，也使得我们陷入前所未有的迷思之中。如何在保存传统价值的同时又吸纳现代价值，令澳门独有的文化特征生生不息；如何在维护秩序的同时又产生活力，令新生的特别行政区在回归祖国之后又坦然地面对全球化的挑战，稳定有序地步入国际化的轨道，并可持续地发展繁荣，诸如此类重大问题，恐怕不能单靠经济和社会政策来破解，更需要我们从文化深层去寻求答案。这是摆在学界面前一个重要课题，也是学者不可推卸的社会责任。然玲的论文适逢其时，足资参考，可贺可喜。

当然，本书仅仅是一篇博士论文，难以承载如此之重任，诸多问题尚需更多的专家学者进一步商榷和研究。即便是论文所涉及的问题，然玲在写作过程中也遇到过很多困惑，她受何芳川师之嘱托，也多次同我长时间沟通、切磋。诸如用“递进重构”模式来概括近代早期澳门的历史文化发展进程是否科学，是否还有更好、更得当的方法；历史学研究与文化分析的复杂性究竟如何结合，合适度在哪里，而且如果从较大规模、从较长历史波段，并从文化分类的角度来考察一个城市的文化史，还要提出澳门文化发展的递进性、重构性等特征，这种研究方法是否合理？限于理论水平、分析能力和写作时间，还有待进一步研究，也期待更多的学者参与讨论。我想，作者出版其博士论文之根本目的，也是为了抛砖引玉，求教于方家。

多年前，然玲开题之时，何师芳川兄领她来看我，仿如昨天，其音容笑貌，历历在目。然玲论文付梓之时，芳川兄早已乘大帆船远游他方，其高大身躯，消失于地平线。史学者是不该相信宿命的，但近年种种事件，又叫人不禁自问：莫非历史就是这样写成的？我不忍也无权谴责历史的残酷无情，惋惜生命、感慨命运之余，更令人对乐天知命的芳川兄增添了几份敬意。的确，我十分佩服他的宏观历史视野，佩服他的独特选题

眼光，也万分欣佩他的严谨治学精神。澳门历史文化有今天的成绩，全赖似芳川兄这样的学者的鼓励、支持、推动和耕耘。我知道，要不是芳川兄的激励指导，然玲是不敢贸然接受如此重大的题目来写的。芳川兄去世后，其精神依然感召着然玲。在我友徐凯教授的指导下，她终于完成了论文。如今然玲嘱我写序，于公于私，当不敢推托。然玲论文的面世，若芳川兄泉下有知，也应老怀大慰。然玲当不负尊师之重望，师承其志，继续努力，不断有新成果面世，为澳门文史研究、为东西方文明交流添砖加瓦，贡献一份力量。

吴志良\*

二〇〇八年一月初稿于长沙

除夕定稿于澳门



---

\* 吴志良（1964年—），澳门基金会行政委员会委员，北京外国语大学客座教授、博士生导师。

# 目 录

序 一	(1)
序 二	(4)
绪 论	(1)
一、文化视角下的澳门个案研究	(3)
二、与本书有关的几个主要概念	(5)
三、澳门历史、文化研究综述	(14)
四、关于澳门文化的“三个研究层次” 和“四种文化向量组合”	(25)
五、史料的审读与利用	(30)
第一章 从隔绝到撞击	(34)
第一节 15至16世纪的中华文化特征	(34)
一、国家文化的表征——儒家文明	(34)
二、天朝居中的华夷观念	(36)
三、“羁縻”、“怀柔”的对外策略	(37)
四、朝贡贸易——明清外交的基本模式	(38)
五、15至16世纪中国人海洋观的转变	(39)
第二节 大航海时代欧洲人的文化观	(41)
一、重商主义思潮	(41)
二、人文主义文化观与文艺复兴	(42)
三、宗教改革和大航海时代欧洲人 对东方的认识	(43)
第三节 走出罗卡角，开启新时代	(45)





一、分割地球——《托德西利亚斯条约》	(45)
二、“路止于此，海始于斯”	(47)
三、相对宽容的文化观	(51)
四、“帝国孤女”试验和“生物社会扩展”政策	(53)
五、十字架与火剑并举	(54)
第四节 寻找“秦人”，中葡初次接触	(57)
一、寻找“秦人”	(58)
二、初次接触	(60)
三、“以柔克刚”对华指导原则的确立	(65)
第五节 澳门渔港文化追溯	(67)
一、海舶贸易	(67)
二、“龙涎香”与澳门开埠	(69)
三、澳门(Macau)名称的意蕴	(73)
第二章 “拉丁文明”的侵入	(76)
第一节 西方政治文化移植澳门	(77)
一、加比丹·莫尔制度	(77)
二、侨民自治机制与议事会制度的建立	(80)
第二节 西方宗教文化的渗入	(83)
一、艰难地寻找文化契合点	(83)
二、“无心插柳柳成荫”	(93)
三、文明的差异与误读	(96)
四、从冲突到理解与对话	(100)
第三节 远东基督教“堡垒”的建立	(104)
一、澳门葡萄牙教区的建立	(104)
二、圣保禄学院的历史作用	(108)
三、西方人对中国、澳门的早期观察	(115)
第四节 多民族混杂社会的雏形	(126)
一、澳门人口结构的变化	(126)

二、“蕃坊”制度与澳门行政管理体制	(128)
三、明清士大夫笔下的澳门	(133)
<b>第三章 重商主义的兴起</b>	(140)
第一节 白银贸易与重商主义	(141)
一、“海禁”与澳门的勃兴	(141)
二、“财富”来自海洋	(145)
第二节 内陆系统与澳门港的互动	(153)
一、“天子南库”与澳门	(154)
二、新物品的引进	(155)
三、澳门的佛郎机铳	(157)
四、与内陆经济、文化的互动	(161)
第三节 与周边区域异质文化的交流与互动	(163)
一、澳门周边水域的华商散置网	(163)
二、多边纳贡贸易网与澳门	(168)
第四节 传教士与澳门海上贸易	(176)
一、“神父之船”	(176)
二、商业贸易的中介、通译	(180)
<b>第四章 文化的调适与生存</b>	(185)
第一节 岭南文化与澳门	(186)
一、岭南文化	(186)
二、汉文化的根基，岭南文化的底蕴	(191)
三、澳门宗教的世俗性、本土化	(195)
四、澳门妈祖文化与商业文化的互动	(199)
第二节 清前期澳门政治文化特色	(201)
一、清前期国家权力在澳门的强化	(202)
二、康、雍、乾时期对澳门的管理策略 与理念	(204)
第三节 “礼仪之争”与澳门国家政治 文化的加强	(215)





一、尊重中华纲常？恪守基督戒律？	(215)
二、“礼仪之争”与澳门	(219)
第四节 澳葡的文化自觉与调适	(223)
一、“理事官”：中葡之间的双重代理	(225)
二、澳葡与清朝权力之间的角力	(226)
三、中葡外交关系之肇始	(230)
第五章 葡河汉界，各美其美	(236)
第一节 澳门城市结构变化与族群文化	(236)
一、澳门早期社会结构与族群性特征	(236)
二、《职贡图》与澳门	(238)
三、土生葡人族群文化模式与文化认同	(242)
第二节 佛、道文化与世俗文化的接合	(247)
一、郊庙文化特征	(248)
二、庙会与“赶墟”	(252)
第三节 多元建筑文化的糅合	(255)
一、西方城市理念进入澳门	(256)
二、多元居住模式的形成与组合	(258)
三、大三巴牌坊——早期中西文化冲突、 交流的“孤独见证人”	(263)
第四节 从“多元”走向“一体”	(268)
一、教堂与禅林的交错	(268)
二、亚欧民俗风情的交织	(272)
三、钱纳利、琳呱、博尔杰的澳门画	(275)
四、“亦中亦西”的两栖文化环境	(279)
第六章 中西方文明的交织与消长	(284)
第一节 中、葡、英三国政治文化地位	
在澳门的失衡与转换	(285)
一、新一轮霸权纷至沓来	(285)
二、葡萄牙《王室制诰》的颁布	(287)
三、清朝统治在澳门的式微	(289)

四、葡国的没落和澳葡政治文化的衰退	(291)
五、盎格鲁·撒克逊文化的强行渗透	(294)
第二节 “外向型经济”结构与西方	
消费模式	(298)
一、“番妇”居澳合法化	(298)
二、经济结构与消费模式的转化	(300)
三、国际化氛围的加重和语言结构的演变	
	(310)
第三节 基督教新教文化“洗礼”澳门	(313)
一、马礼逊与澳门新教文化的传播	(314)
二、传教士与鸦片战争	(316)
第四节 “外压”下的西方文化传播与摄取	
	(322)
一、西方新文化的传播	(322)
二、公民意识的觉醒	(324)
三、近代传媒的产生	(325)
四、中国人“开眼”看世界	(331)
五、资产阶级创新思想传播的舆论阵地	
——《镜海丛报》、《知新报》	(338)
第五节 文明的消长与中葡权力文化系统的失衡	
	(341)
一、“跷跷板”的失衡	(341)
二、殖民地文化色彩的加强	(344)
三、《中葡和好通商条约》——葡萄牙成为澳门的管理者	
	(348)
四、城市文化走向“畸形”	(352)
结论：澳门文化“递进重构”模式的特点与历史意义	
	(357)
参考文献	(369)
后记	(383)

